



(1981—1991)

中共党史研究 优秀论文选

中国中共党史学会 编

ZHONG
GONG
DANG
SHI
YAN
JIU
YOU
XIU
LUN
WEN
XUAN

中共党史出版社

D23-53

3

89857

DH89/12

中共党史研究优秀论文选

(1981—1991)

中国中共党史学会 编

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2·北京

(京)新登字 071 号

责任编辑:姚 宏

责任校对:邹祖兴

中共党史研究优秀论文选(1981—1991)

中国中共党史学会编

出版发行:中 共 党 史 出 版 社

(北京 1929 信箱 中央党校南院)

经 销:新 华 书 店

印 刷:密 云 胶 印 厂

850×1168 毫米 32 开 21·5 印张 550 千字

1992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199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3700 册

ISBN 7-80023-298-0/K·316

定 价:12.00 元

目 录

必须科学地分析和研究历史经验	胡 绳(1)
回顾毛泽东关于防止和平演变的论述	逢先知(11)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 新发展	胡 华(26)
军事历史与军事改革	姜思毅(34)
毛泽东和中国革命的新道路	沙健孙(43)
论毛泽东的战略策略思想	陈 文 乔毅民 徐正明(64)
反对教条主义是毛泽东思想形成发展的一个 重要历史特点	郑德荣 何荣棣(83)
试论马克思学说在中国发展的历史特点	唐纯良(96)
中共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策略演变	丁晓强(105)
大革命时期中共对国民党的关系和策略	肖 挂(122)
关于“党内合作”问题的探讨	郑应洽(138)
关于一九二五年十月中共中央扩大执员会	王学启(150)
北伐战争中的江西战场	周奎书 廖信春(161)
论大革命时期陈独秀与共产国际的关系	唐宝林(178)
大革命时期党在武装斗争问题上的得失与 南昌起义的爆发	何 沁(188)
对党的六大的历史考察	金冲及(200)

试论八七会议到六大的工作转变·····	金再及(215)
共产国际和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道路·····	孙其明(234)
百色起义的特点和意义·····	吴忠才(250)
论中共中央《“一、二六”指示信》对东北抗日斗争 的影响·····	李鸿文(261)
闽中区是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一块独立的 游击区·····	阎景堂(273)
红军东征与山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张国祥(281)
关于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方针问题·····	丁雍年(292)
论抗日战争·····	李 新(297)
抗日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 的战略转变·····	马齐彬 赵丽江(318)
新四军成立经过新探·····	童志强(331)
皖南事变始末·····	曹雁行 蔡震光(342)
一个特殊的战略地带——长城线上“无人区”·····	陈 平(359)
华侨与第二次国共合作·····	黄慰慈 许肖生(372)
论苏联、共产国际与新疆盛世才的关系 ·····	朱培民(385)
抗日战争结束前后中国共产党对美国政策 的演变·····	章百家(399)
抗日战争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苏联与中国 革命的关系·····	廖盖隆(414)
胜利的中原突围·····	鄂豫边区革命史编辑室(430)
毛泽东挺进中原战略决策的形成及其特点·····	王世根(440)
论解放战争的战略决战·····	王道平(451)
试述山东人民支援解放战争的特点与经验·····	王东溟(465)
对海南革命根据地二十三年红旗不倒的初 步探讨·····	陆 军 邢诒孔(477)

论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的思想·····	董 谦(493)
建国初期党和国家对外资在华企业的政策·····	宋仲福(515)
毛泽东军事思想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运用发展·····	孟照辉(527)
对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十年的再认识·····	陈诗惠(538)
六十年代上海国民经济调整凝聚的历史经验·····	张文清(550)
“文化大革命”为什么必须彻底否定·····	金春明(561)
毛泽东对马克思“资产阶级权利”概念的误解·····	石仲泉(573)
邓小平对科学地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 的贡献·····	王 洪(584)
关于陈独秀一生活动的的评价·····	王洪模(599)
“歌特”为张闻天化名考·····	程中原(620)
宋庆龄与保卫中国同盟·····	刘家泉 甘永梅(631)
林伯渠的经济思想及其实践·····	宋斐夫(642)
中国共产党史学会首届党史优秀论文评奖活动 纪略·····	王朝美(659)
中国中共党史学会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 优秀论文评奖获奖名单·····	(665)
后 记·····	(677)

必须科学地分析和研究历史经验^{*}

胡 绳

(一)

一个人做了一段工作以后,需要总结一下经验,看看自己有哪些做得对,做得好,哪些做得不对,做得不好,有哪些成绩和优点,有哪些失误和缺点。这就是实事求是地进行具体分析。

对社会历史经验、革命事业的经验也需要总结。总结也就是实事求是地进行具体分析。对于许多事情,不能说:成功的、好的就一切都好;失败的、错误的就一切都错。其所以要总结过去的经验,是为了有利于今后的实践。但如果不作科学的具体分析,就不可能从过去的经验中学得更聪敏一些,不可能得出有益于新的实践的教训,不可能有助于在新的实践中坚持正确的东西,克服错误的东西,做得更好一些。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这样说,要完全地解决“理论的东西之是否符合于客观真理性这个问题”,“只有把理性的东西再回到社会实践中去,应用理论于实践,看它是否能够达到预想的目的”。由此,固然可以说,只有成功地达到预想的目的,这种理论才是正确的,才可以被称为真理;反之,就是错误的,或者不完备的、有错误的,或者尚未被证实的。一些最简单的事情,也许一次检验,就能判定是非(但对这样的简单的事大

* 原载《真理的追求》1990年第4期。

概不能使用真理这样的大字眼)。科学实验室内的某种试验,经过几十次、几百次的失败,然后成功,达到预想的日的,这样的情形是常有的。在最后一次的成功以前的每一次失败,并不是根本推翻了预想;在失败的经验中固然包含着错误,但也包含着导致成功的因素。不断地总结这些失败的经验,可能使预想更完备,并且终于达到成功。

社会历史的发展,革命和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事业是极为复杂的事情。人们要掌握自然界的规律性,使自己的认识符合于自然界的客观规律性,从而能在物质生产、利用或改造自然的行动中达到预想的结果,是很不容易的,这往往是经过生产实践和科学实验的许多次失败的经验才能达到的。从一定意义上说,人们要掌握社会历史的客观规律性是更难一些,或更难得多。这是因为,第一,社会历史现象不像自然现象那样反复地完全同样地出现。物质生产和科学实验,一次失败了,可以在完全同样的条件下重新进行,但社会历史实践就不可能是这样的情形。第二,社会历史现象是人们自己的活动所形成的。人们在认识社会历史过程,特别是自己所亲自参与了的过程时,往往容易因为有某些主观成分的干预而不能真正做到客观地科学地全面地去进行分析和研究。如果在研究自然现象时,在研究以自然现象为对象的实践经验时,人们必须注意破除成见与偏见,那么在研究社会历史现象中更加需要注意这点。

这里之所以特别指出掌握社会历史发展规律是极为艰难的,无非是为了说明总结实践经验的重要性。这方面的认识是否正确只有经过阶级斗争和社会建设的实践的考验才能判定。错误的认识经过实践而得到纠正,不完全的认识经过实践而逐步提高到完全的认识。毛泽东说:“人们要想得到工作的胜利即得到预想的结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如果不合,就会在实践中失败。人们经过失败之后,也就从失败取得教训,改正自己的思想使之适合于外界的规律性,人们就能变失败为胜利”。很

明显的，要能从失败中很好地取得教训，就必须认真地总结经验，也就是对经验给以科学的分析。

社会历史实践是不可能完全同样地重复的。但人们可以在新的条件下利用过去的成功经验，但如果不对成功的经验进行分析，就不能很好地加以利用。失败的经验之所以有用处，并不因为人们可以在完全同样的条件下进行这种实践。虽然具体条件变化了，但仍然可以利用失败的经验来改正自己的思想，这就更需要对经验进行科学的分析。

(二)

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经历了失败、成功、失败、成功的复杂曲折的经历。一次大失败是在 1927 年，又一次大失败是在 1934 年。对于失败的经验如何总结，是个重要的问题，这里只说一下 1934 年的失败。那时，红军被迫放弃南方根据地，艰苦地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那时，党的力量在苏区损失了 90%，白区损失了几乎 100%。

这个失败说明了什么呢？当时在中国至少有三种说法。国民党反动派说，这个失败证明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还有一些在 1927 年革命失败后脱离了党的托陈取消派分子，他们作出另一种结论。他们认为，1934 年的失败证明共产党到农村去进行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这条路线是完全错了；中国已进入了资本主义和平发展时期，无产阶级只能进行合法斗争，不能进行武装革命。他们的结论是取消革命。中国共产党是怎么总结的呢？遵义会议和以后党的许多文件都认为，1934 年的失败并不证明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于中国国情，也不证明无产阶级党到农村去搞武装斗争错了；其所以失败是因为没有能把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好，是因为在革命的战略策略上犯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

对同一个革命失败的现象，不同的人得出不同的结论，这是不

同的立场、观点、方法的反映。从大资产阶级大地主阶级的反共立场出发的人当然乐于采取上述第一种说法。托陈取消派的人数甚少，但他们的情况比较复杂，总的说来，他们既不了解中国的国情，又从1927年的上一次革命失败中已经得出了取消革命的结论，他们当然不可能正确地认识1934年的失败的经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能对这次失败作出正确的结论，是因为他们站在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者的立场上，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如实地认识中国社会的阶级矛盾，并且对党内“左”倾的错误作了科学的分析。这种结论的正确性在后来的实践中得到了完全的证明。

遵义会议以后的党中央纠正了从1931年1月的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以后三年间在党内占统治地位的“左”倾路线，从而在长征以后使党的力量重新迅速生长起来，为中国革命开辟了新的天地。但是党对左倾路线不是简单地加以否定，而是实事求是地进行科学的分析。这里可以举毛泽东1944年在《学习与时局》中所说的一段话为例：

“对于任何问题应取分析态度，不要否定一切。例如对于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时期中央的领导路线问题，应作两方面的分析：一方面，应指出那个时期中央领导机关所采取的政治策略、军事策略和干部政策在其主要方面都是错误的；另一方面，应指出当时犯错误的同志在反对蒋介石、主张土地革命和红军斗争这些基本问题上，和我们之间是没有争论的。即在策略方面也要进行分析。例如在土地问题上，当时的错误是实行了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过左政策，但在没收地主土地分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这一点上，则是和我们一致的。列宁说，对于具体情况作具体的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我们许多同志缺乏分析的头脑，对于复杂事物，不愿作反复深入的分析研究，而爱作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简单结论。我们报纸上分析文章的缺乏，党内分析习惯的还没有完全养成，都表示这个毛病的存在。今后应

该改善这种状况。”可以说，这是对失败的经验，实事求是地进行科学分析的一个范例。

那么，对于成功的经验，是否也要进行分析呢？也是需要的。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预定的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的革命目标，在1949年达到了，这证明原来的预想，包括武装斗争、以农村包围城市、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广泛的统一战线等方针、策略都是正确的。就在取得胜利的时候，毛泽东指出，在夺取胜利之后，为巩固这个胜利，还需要很长的时间，花费很大的气力；我们熟悉的东西有些快要闲置起来了，我们还应该学会许多原来不懂的东西；而且要求全党警惕因为胜利而可能生长起来的骄傲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等等。这些论述中都包含着对于成功经验的分析。

新民主主义时期的革命经验，许多对于社会主义时期还是有用的。例如，注重从思想上建党的经验，群众路线的经验，统一战线的经验，等等。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为什么必须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什么中国革命胜利以后，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要说明这些根本问题也离不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经验。但同时也必须注意到，过去的有用的经验必须结合新的历史条件来运用并加以发展，不能简单地袭用过去的经验。新的历史时期提出了新的任务，要求做许多新的工作，当然更不能完全靠过去的经验。例如，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我们的军队中，在党领导的农村政权中，建立了一种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的民主风气。不过，在我们的整个国家政治、社会生活中，民主传统还是很不够。因此，满足于过去的经验是不对的。

我们既不像那些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否定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验（他们以否定这些来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同时又要善于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验，包括成功和失败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分析。

(三)

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走上了一条历史发展的必然的道路。但在中国的历史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又是十分艰难的事。

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不但歪曲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更多的是歪曲社会主义时期的历史。他们攻击说,社会主义完全搞糟了,完全搞错了,根本不应该搞社会主义。他们利用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某些时期,在某些方面犯过的错误,特别是利用“文化大革命”来进行攻击。他们所使用的方法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就是不讲别的,只讲错误、缺点、失误,并且竭力加以夸大,进行攻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至今 40 年有余。这期间,在经济建设、文化教育事业、科学技术事业、城乡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提高等各方面所取得的成就都是抹煞不了的。国民生产总值(GNP)是可以反映国家的总体实力的一个综合指标。经济学家根据有关材料计算,从 1951 年到 1987 年将近 40 年间,我国 GNP 以年平均 7.37% 的速度增长,这一增长速度高于美国的 3.17%,日本的 6.9%,印度的 4.01%。拿工业增长速度说,1951 年到 1987 年间,中国工业生产年平均增长率是 11.5%,而发达国家平均为 4.2%,发展中国家平均为 5.9%,世界平均为 4.4%,所以和世界各国相比,我们的经济发展也是毫无愧色的。如果不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而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只能在原始的资本主义阶段上踟蹰,且不说国外势力的侵入,中国的大地上会出现在 10 亿左右的人口中的剧烈的阶级分化和随之而来的政治动乱,上述的各种成就是无法设想的。

的确,我们在建国以后,有成功的时期,也有挫折、失误的时期。从 50 年代后期起,有过许多失误,甚至最后造成“文化大革命”这样的灾难。我们要科学地总结经验,要特别重视对缺点、错误的经验教训的总结。1981 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所作的《关于建

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进行这种总结作了很好的开端和榜样。这个决议既如实地肯定了成就，又毫不含糊地指出从50年代所开始的“左”倾指导思想的错误。大家知道，正因为我们党能够很好地总结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正面和反面的经验，党才能够在1978年以后提出并执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路线和方针，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进行了坚持不懈和卓有成效的努力。

这里要特别说一下，总结建国以来的历史，决不能像那些诬蔑我们的人那样，把事情说成一团漆黑，因为事实并不是这样。即使犯错误的时候，也要一分为二地看。比如1958年到1960年的“大跃进”，号召全民土法炼钢，提出几年“超英赶美”的口号，当然是错误的，不但违反社会和经济规律，而且违反了自然科学的规律。这些错误的教训应该吸取。但是也有材料说明，从建国以后到1969年建设的大中型企业，主要是重工业，2/3的项目是在这三年中开工的。这三年中，在钢、铁、煤以及轻工业各方面形成一大批长期起作用的生产能力。大庆油田就是在这期间创立的。当时的“大跃进”确实调动了广大群众的积极性，但是在急于求成的“左”的指导思想下，浪费了大量人力物力，造成了随后用几年才克服的很坏的后果，但同时也还是取得了许多成就，这样来看，可能是比较恰当些。

搞人民公社，确是包含很多的空想、不切实际的东西，效果不好。对从土改到人民公社的全过程，应该认真地分析研究。反封建的土地改革是在中国大地上的伟大胜利，引导土改后产生的广大个体农民走上合作化也是正确的。在合作化过程中发生许多偏差，要求越大越公越好，过快地搞到高级合作社，尤其是搞到人民公社，这里确有许多应当记取的教训。人民公社的体制虽然做了调整，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但是由于生产关系不适合于生产力的发展而造成的流弊仍然没有根本消除。1978年以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12年的经验说明，这样的改革是完全必要的。现

在回头来看整个过程,能不能说,农村是回到了合作化以前的个体经济,本来就不应该搞合作化,合作化毫无意义,完全错误?用这样简单的形而上学的方法对待如此复杂的历史现象是不可取的。以下可以指出三点:第一,农业合作化是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的。比如说,农民利用集体的力量,搞了许多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这是农民对农业所做的很大的投入。农业没有投入是不行的,只靠国家投入也是不行的,大量的投入要靠农民。如果只有个体经济,没有合作化,农民不可能做出那么大量的有效的投入。在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最初几年,农业生产增长很快的重要因素之一是过去多年间搞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第二,在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过去的集体经济的经验并不是一笔勾销了。固然各地情况不同,但是许多地方用集体力量办乡镇企业,办农业生产过程中的各种服务工作,收效很大,而且很有前途。第三,旧中国的农村从来没有合作化经验(这种经验在有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农民那里是有的),有的只是“变工”的极低级的形式。土改后的农民在合作化的过程中学到了很多经验,知道合作化在哪些方面可以起积极作用,怎样搞就不行。这是一次很重要的学习。也许可以说,为学习付出了太大的代价。但是几亿农民进行了这种学习,取得了经验,这不仅对现在,而且很可能长期起积极的作用。

以上只是举例说明在总结经验中绝不能作简单化的判断,必须如实地科学地分析。

最后要说一下“文化大革命”。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总是把“文化大革命”当作攻击社会主义的缺口。以为可以利用“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来根本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但这是徒劳的。

党的历史决议中分析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及其产生原因,并且对“文化大革命”时期的许多现象进行了分析。党的结论是,完全否定“文化大革命”这个运动。完全否定并不就是不要进行分析研究。“文化大革命”之所以产生,并且愈演愈烈,延长达十年之久,这是由许多复杂因素形成的。固然在建设全新的社会主义的事业

中,错误和失误是难免的,但是“文化大革命”这样严重的长期的错误并不是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必然产生的现象。类似的现象更不是必然会重复产生,相反的,已经有了这一经验,类似的现象必将能够制止。

毛泽东同志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负有主要的责任。党的历史决议对他作为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错误作了仔细的分析。他虽然有错误,但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也仍做过许多好的工作,特别是在外交方面。他对林彪、“四人帮”的活动也有所抵制和限制。他对“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是完全错误的,但他所提出的错误观点,就其出发点说,却往往带有正确性。真理夸大一步就成为谬误。虽然不能因此模糊谬误和正确的区别,但仔细分析如何从有正确性的某种观点出发,一经夸大,就成为谬误,这对于后人实在是非常有益的经验教训。

把“文化大革命”和“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历史区别开来,是十分必要的。在这时期并不是只有武斗,只有混乱。我国的农业生产在这期间是发展得比较好的,还建设了些重要的大型企业,修筑了一些难度很大的铁路和南京长江大桥,许多科学家在党领导下艰苦工作,实现了氢弹试验成功和卫星发射,等等。历史决议中说,遭到打击和折磨的知识分子、劳动模范、民主人士、爱国华侨,还有各民族、各阶层的干部和群众,绝大多数都没有动摇热爱祖国和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立场。这是事实。从领导层讲,有周恩来、邓小平,还有其他许多同志用他们的努力使“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许多党内、党外的同志,在遭逢种种的艰难和不公正的待遇的时候,或者认真考虑问题,或者认真地读马列的书,或者做各种专门知识的研究,抵制这个潮流。毛泽东虽然享有崇高的威望,但是在“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潮流前,他越来越失去控制局面的能力。如果问“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历史的主角是谁?显然不是终于彻底崩溃的林彪、“四人帮”,而是以各种方式抵制“文化大革命”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广大群众,是那些党内、党外

处于极困难的条件下，仍坚持热爱祖国、热爱党、拥护社会主义的人。正因为有这样的群众基础，我们党才能用自身的力量把“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纠正过来，而且用不长的时间通过总结经验教训，找到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

“文化大革命”的经验确实证明“左”的路线，“左”的指导方针是错误的。“左”的指导方针为林彪、“四人帮”这种反社会主义的力量造成放肆活动的条件，各种野心家乘机活动。这个深刻教训必须记取。但是“文化大革命”给我们的教训不止这一条。还有一条是，中国如果离开社会主义道路，就会大乱，发生大灾难。林彪、“四人帮”在“左”的口号下实行封建法西斯专政，背叛了社会主义道路，只能把中国带到大动乱中去。

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包括“文化大革命”的经验都证明，能够领导中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克服各种偏离和破坏社会主义倾向的，只有中国共产党，也只有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实际经验证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主张，即要使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主张是完全错误的。我们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前途充满信心，这种信心不是虚构出来的，也不只是根据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这种信心是由科学地分析、研究和总结我们的历史经验而树立起来和增强起来的。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回顾毛泽东关于防止和平演变的论述^{*}

逢 先 知

经过 1989 年春夏之交在我国发生的动乱和北京发生的反革命暴乱,以及这一年秋冬以来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所发生的动荡,回顾一下毛泽东关于防止和平演变的论述以及与此有关的其他思想,是很有必要、很有意义的。

从 50 年代末期起,毛泽东在指导思想上犯有“左”的错误,最终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关于这个问题,在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已经作了结论。这一《决议》是完全正确的。今天我们需要在这一《决议》的指导下,对毛泽东从 50 年代末期以来的一些思想作具体分析:对于其确实是错误的,应当坚决予以抛弃;对于其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是正确或基本正确的,应当继承、借鉴;对于一些正确与错误交织在一起的,则要加以分析,吸收其正确的部分,剔除其错误的部分。毛泽东关于防止和平演变和其他有关问题的论述,就是应当很好地加以研究和学习的

一 关于防止和平演变问题

当美国的杜勒斯刚一提出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的战略,毛泽东就敏锐地觉察到这个问题,抓住这个问题,首先是向党内的领导干部,尔后又向全党、全国人民进行教育,提高人们对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的警惕性。根据现在

* 原载《真理的追求》1990 年创刊号。